



朱诚如
主编

清朝通史

顺治朝
分卷
李治亭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主 编
朱诚如

清朝通史

舒功题



顺治朝 分卷

主 编
李治亭

紫禁城出版社

200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朝通史·顺治朝/朱诚如主编, 李治亭分卷主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047-380-5

I. 清… II. ①朱…②李… III. 中国—古代史—
清代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338 号

清 朝 通 史

主 编 朱诚如

顺治朝 分卷

主 编 李治亭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53 千字 印张 20.7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047-380-5/K·177

定价: 52.00 元

总 前 言

历时 4 个寒暑，由全国数十位清史专家学者辛勤撰写的《清朝通史》12 卷 14 册即将付梓，作为全书的总主编，谨赘数语，以为前言。

自清末迄今，近代的清史研究已经走过 90 多年的风雨历程。经过几代清史学者的辛勤耕耘，清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术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传统史学、实证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份被抛弃，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史学界全面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清史研究随之进入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学者们高度重视从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的角度考察清代历史，学术界关于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对清代阶级关系的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史研究的面貌，使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认识，从历史的表象进入到深层，从上层建筑深入到经济基础。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但扩大了人们的学术视野，而且加强了清史研究的科学性。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既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清史研究取得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思想在解放，研究方法在更新，研究领域在扩

大，研究水平在提高，清史研究逐渐形成充满朝气和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断代史著作的大量出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郑天挺《清史简述》、鄂世鏞《清史简编》上编、戴逸主编《简明清史》、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戴逸和李文海主编《清通鉴》、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王戎笙等《清代全史》等。这些著作尽管风格不一，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学风严谨、勇于创新是其共同特点。此外，一些中国通史的清史部分，资料翔实，结构完整，也可以说是高水平的清史断代史著作。如蔡美彪主持撰写的《中国通史》第8、9、10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史稿》第7册，等等。上述这些断代清史著作都能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从综合性的角度，全面把握清史发展的脉络，探寻治乱盛衰的根源，反映了当代清史研究的水平^①。

我们这部《清朝通史》，基本上借助于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体例。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采用专题的形式，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于清代自兴起到灭亡300余年历史中所发生的、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军政大事，逐一进行比较翔实的述论，既考订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有专家学者的点睛之评，目的在于以这批学者积年所得撰写的这部著作，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清代历史的盛衰之变，从中受到启迪，并推动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清代历史，如果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代明而立，到辛亥革命（1911年）清朝被推翻，前后有268年；如果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算起，前后有328年；即使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元称汗算起，前后也有295年的时间。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清朝经

^① 参见高翔：《五十年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

历了孕育、发展壮大、鼎盛和衰落的过程；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历史也经历了由古代到近代、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为了充分展示清代历史的盛衰之变，揭示其经验教训，本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写起，直到辛亥革命（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

作为《清朝通史》附录的《清史图典》12册已经先行付梓。《清史图典》收录了近5 000幅与清朝历史相关的图像，其中有1/3是第一次见诸出版物。这些图像，或藏之于皇宫，或散失在民间，或流落于海外，我们尽力予以搜集和筛选，意在通过文字和图像相结合，使读者对清朝历史有一个感性认识，加深对清朝历史的理解。

全书由朱诚如教授任总主编，并负责总体设计、规范体例、撰写总序、全书终审。各分卷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具体分工如下：第一卷主编朱诚如教授；第二、第三卷主编阎崇年研究员；第四卷主编李治亭研究员；第五卷主编王思治教授；第六卷主编为冯尔康教授；第七卷主编周远廉研究员；第八卷主编张玉芬教授；第九卷主编喻大华教授；第十卷主编马东玉教授；第十一卷主编余同元教授；第十二卷《大事记》主编孟宪刚教授。对于参与全书撰写工作的各分卷主编和其他学者的通力合作深致谢意。

为便于读者核对资料，本书的注释采用篇目和页码相结合的方式，每卷在首次使用某种史料时均注明版本，如“《清史稿》卷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四，第833页，中华书局，1986年”等。

本书中的数字表述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方式，但也有某些篇目为庄重计保留了汉字表述方式。谨做此说明。

由于清史时间跨度较长、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又头绪繁多，真正动手写作的时候颇觉踌躇，好在及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学术单位众多学界前辈和师友的支持和鼓励，从而使我们有信心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在此我们深表谢意。同时，由于该书体例目前还只是一种尝试，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因此希望得到诸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得到文化部、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著名学者启功先生为本书和图典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朱诚如

2002年10月于北京

导 言

顺治朝是清朝 268 年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承太祖、太宗之遗业，开创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新纪元，为未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顺治朝承前启后，实居关键地位。正确认识和评价顺治朝，对正确认识评价全部清史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一)

顺治朝始于崇德八年（1643 年）八月福临即皇帝位之时。福临是太宗皇太极第九子。皇太极刚去世，各派角逐皇位，在势均力敌、相互妥协中，推出福临为帝。这是他的一个莫大幸运，即位时年仅 6 岁。以明年为顺治元年，至顺治十八年（1661 年）正月，福临病逝，年龄只有 24 岁，庙号世祖。顺治朝到此结束。福临 6 岁即位，是个名副其实的“儿童皇帝”。年幼无知，难以理政。诸王贝勒推举睿亲王多尔袞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为辅政王，代理皇帝主持朝政及一切日常政务。在多尔袞独擅摄政时期，是顺治朝历史的第一阶段。当多尔袞于顺治七年（1650 年）十二月病逝，其摄政亦告终结，至次年，福临已满 14 岁，遂举行亲

政大典，自此直至去世，福临独操皇帝大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

很清楚，顺治朝 18 年的历史，自成阶段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为摄政，后为福临亲政。两个时期，贯彻治国的方略却是一脉相承。

当我们展开顺治朝的历史，或者说，如何诠释顺治朝的历史时，首先应认清它所处的时代，换言之，把它置于其所处的时代，是考察顺治朝历史的必要前提。时代认清了，顺治朝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会得到合理地解释。

从世界的范围看问题，17 世纪 40 年代中叶，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在或已经取代了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毫无疑问，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整个西欧都在酝酿并迅速发生同样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论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是否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论它们处于何种社会发展阶段，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代表，标志着人类社会已进入以资本主义为旗帜的新时代，也就是说，英国的这场社会大变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同时同步，在地球的另一方，遥远的东方——中国，也发生一场社会大变动，这就是明清鼎革、改朝换代。明清之际的人们惊呼为“天崩地解”。在他们看来，有 270 多年历史的庞大的明朝突然沦亡，世居关外的“属夷”满洲即清朝竟然入关，声势浩大的“流寇”竟也横行天下，简直是天蹋地陷！可惜，中国的这场变革，并不具有真正的社会革命的意义。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所谓明清鼎革，只是王朝的更替，由朱家姓换上爱新觉罗氏。而英国所发生的变革，不是中国式的王朝更替，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代替腐朽落后的封建地主阶

级，其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稍加对比，就会明白：两者的变革的性质根本不同，其内容天差地别，因此所带来的结果也截然相反。

从以往延续至今，学术界仍有一种意见，指责清朝入主中原，延缓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重建封建制王朝，把中国拉向“倒退”，与英国相比，中国远远地落到了后面。这种意见或相类似的其他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此说完全脱离中国历史实际，是建立在空想或想当然的主观意识之中的空洞说教，算不上科学的分析。

如按上述说法，清朝入主中原，把中国拉向“倒退”，那么，顺治朝首当其冲。它是清入关后的第一朝、第一帝，一切问题都根源于这一朝。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清朝接续的明朝是个何种性质的政权，在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毫无疑问，明朝是一个高度封建专制的国家政权，中国依然处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仅在江南及沿海的部分城镇、地区有所滋长，也仅仅是“稀疏”的萌芽，远未形成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更谈不上自成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北方，在远离交通线的边远地区，连一点“萌芽”的影子也看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根本不存在。有些学术著作称：15、16 世纪的中国还不落后，或者说，还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了 17 世纪以后，中国才落后了。这一说法也不确切。事实是，西方尚未赶上来，才显出中国的先进，不过是封建生产力较为充分发展而已。实际上，就社会发展的“进度”来说，中国社会内部的进展已经落后于西欧。尤其应看到，明朝统治时期，特别是到中后期，其封建剥削相当繁重。当时，地主

取租基本是十取其五，江南地区更重，达到每亩交租至一石二斗^①，远远超过十取其五的水平，农民一年所剩无几！农民的土地纷纷进入皇室、官绅与地主之家。土地高度集中，举凡仕宦绅衿所占土地连阡陌。如，江南豪右之家拥有土地多至7万顷。嘉靖时宰相严嵩，其所在原籍江西袁州，一府四县之田，有十分之七属严氏家族^②。显而易见，如此严重的赋税和经济剥削，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的生长。至明末，国家推行的经济政策更是阻碍或破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生长。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搜括天下民财，特别是那些有矿产、手工作坊的地方，受害尤重。北自陕西，东北自辽东，南至江南，更远至云南，到处都掀起了反抗税监的斗争，民变、暴动，此伏彼起。在那些城镇密集的地区，受害重，反抗也最激烈。矿监税使的肆虐，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严重摧残。崇祯时，又加派练饷、剿饷和辽饷等三饷，已把国家和百姓推向灾难的深渊。至于政治黑暗、腐败，官僚阶层的堕落，士风的崩溃等等，都是典型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君主政体腐朽没落的集中表现。有明一代，是封建经济从繁荣走向衰败，封建专制从巩固走向崩溃直至亡国的历史。在明代，尚未出现新社会的曙光。

人们常说：清承明制。首先，可以认为，从关外兴起的清政权，作为一代新王朝，进关后，它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承明朝的政治制度。其次，继承明制，就意味着全面恢复或者说重建封建体制。如果要求清入关后，抛弃明制，另实施新制如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这是“缘木求鱼”，毫无现实意义，质言之，完

① 《云间据目钞》卷四。转引自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第1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② 《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屠隆：《鸿苞节录》卷二。

全脱离了明代的社会现实。

世界的发展并不平衡，即使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发达与不发达，先进与落后，其差距依然很大。而在 17 世纪，尽管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人类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各个国家和民族仍然循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或特殊规律向前发展。明朝最终崩溃，并非是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崩溃，而是朱姓统治集团的沦亡。清顺治朝入关，重建封建政权，不是倒退，却是顺理成章的继承和发展。这证明中国的封建制度还未到“垂死”挣扎、行将崩溃的阶段，相反，封建专制在中国还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它不仅存在，而且还要向前继续发展。学术界一直把明清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如果仅以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代王朝来衡量，也还说得过去。其实，这种传统说法并不科学。因为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封建专制并未瓦解，还没有找到一个新制度来代替它。它还在继续发展，直到出现资产阶级，才会中止它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列强入侵，中国的封建专制不知还将延续多少年！恰恰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才打断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程，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的确，当英国及西欧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确实落后了。这既不是明朝的责任，也不能算到清代顺治朝的身上。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任何一个人物特别是伟大人物，都无法改变历史的规律，也不可能凭空设想出或创造出一套崭新的社会制度，就是说，他仍不能脱离自身生活的时代，也不能丢弃时代所给予的条件去创造历史。如果这样看问题，顺治朝继承明制就可以理解了，无须遗憾，更无须指责。一言以蔽之，两者的因果继承具有合理性，实属自然之理。

当然，明末统治集团已变得腐朽不堪，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

力，它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灭亡是必然的，亦不足惜。清朝是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它以蓬勃进取的精神力量和得力的政策而赢得了胜利。这一鼎革过程还是体现了以新代旧，以开明代替腐朽的发展规律。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清顺治朝入关参与角逐、竞争，并削平群雄，在短时间统一全国，避免出现分裂，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个问题，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给予合理的评价。

(二)

顺治朝只有 18 年，它究竟做了哪些事？其后果怎样？给历史发展以何种影响？这是认识或研究顺治朝历史必须首先搞清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对于清朝来说，最值得庆幸的是，福临即位才半年多，恰逢明朝被李自成农民军灭亡，这给清朝入关夺权以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决策进关、出动倾国之师，决意与群雄角逐者，不是别人，正是刚出任辅政王的多尔袞！他高瞻远瞩，极富进取与冒险精神，敢于孤注一掷，牢牢抓住历史的机遇不放，获得完全成功。如果没有多尔袞的胆识和远见，坐失千载良机，真不知明亡后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又不知何人主沉浮！

清军入关后，中国已是四分天下的格局：除东北及北部地区，清还占据北京与河北、山东部分地区；李自成虽经山海关失败，实力尚存，还有数十万军队，占据陕西、山西、河南、湖广等省区；张献忠已进川，建大西政权，占有四川天府之国，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最后一支实力更为强大的竞争者，便是占据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南明政权。其优势在于，占地广阔，资源富饶，物产丰盛，足以支撑战争打下去，军队尚有 50 余万，

足以同其他几支力量进行较量；还有，南明在这里的统治基础雄厚，经 200 多年的培育，江南广大士绅对明朝的认同较为深厚。通过四方的实力对比，基本趋于势均力敌，以军事力量说，李自成与南明略占优势，清军总数也不过 20 余万，刚抵李自成与南明的各一半。力量较为弱小些，就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此时，如各方都以力量不足，而保持一段均势，中国就会形成分裂的局面。南明就曾向入主北京的清政权提出和谈的主张，欲划江为守，其结局必是新一轮的南北朝对峙。但是，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不给其他三方以喘息时机，先攻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接着，挥师渡江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再遣大军入川，攻击张献忠领导的大西政权。很快捷报频传：弘光政权出降，清军进入南京；李自成被清军逐出西安，一路溃逃，辗转至江西，被清军击垮，几乎溃不成军，退至湖北通山县，李自成在九宫山被当地地主武装杀害。还有一说，认为李自成逃离通山，潜伏于今湖南省石门县石门寺，削发为僧。总之，不管哪一种说法，李自成自通山就消失了，大顺政权不复存在，他的余部在李过、高一功等将领的率领下，进入荆襄地区的丛山之中，后被南明隆武政权所收编。入川的清军，由肃亲王豪格率领，一举定川，张献忠被射杀，其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将率领，加入南明永历政权，实际是投降了南明。最后，只剩下南明政权，继弘光政权亡后，又有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建元隆武；还有唐王朱聿𣎵称帝于广州，建元绍武。这些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左右，最短的如绍武，只存在一个月，皆于顺治三年（1646 年）相继为清军所攻灭。与此同时，桂王朱由榔又继以上诸政权之后，在广东肇庆即帝位，建元永历。该政权坚持最久，长达 15 年，最后朱由榔被清军逼入缅甸，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被吴三桂擒获，永历政权亦告灭亡。

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即永历灭亡之时，恰好顺治帝亦病逝。顺治朝结束。终顺治之世，以武力定天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除台湾外，实现了大陆的基本统一。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清朝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并为其长久统治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顺治朝迅速统一全国，其意义深远。它避免了中国长期分裂、南北朝对峙局面的出现，因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向心力与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空前发展。特别要看到，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向东方挺进，其侵略魔爪尚未及伸入中国，而中国却迅速地结束了明末以来数十年的动乱局面，实现了新的统一，因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为未来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准备了条件。时至今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仍存分歧。持否定意见的仍坚持清入关是“异民族”入侵、是“异国”大军“兵临城下”；还有的称为民族对民族的“征服”，完全没有看到清朝迅速统一中国的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管怎么说，顺治朝在很短的时间，结束纷乱的局面，迅速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没有理由否认。

清承明制，重建封建政治体制，建立了清对全国统治的政治秩序，也完成于顺治朝。前已指出，在人类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给中国提出了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但是，17世纪的中国还不具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任何可能性，清朝只能选择继承明王朝的封建政体这一条路，重建了一代新的封建王朝。

封建政体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君主专制和它的一套官僚制度。欲重建其封建统治，清入关后，首建一套官制系统。如《清史稿·职官志》“序”说：“世祖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藩部创建，名并七卿，外台督抚，杜其纷

更，著为令甲。”清朝也承认：“我朝设官，大半沿前明数百年旧制。”^①同时，它又掺以满俗，保留本民族的固有旧制，与明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一代独创的特点^②。明罢宰相，行内阁制，设大学士若干，掌管国家的最高权力。其中，身兼六部中的尚书、侍郎衔，便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清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仿照明内阁制，将入关前设置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合称内三院改为内阁，亦分设大学士，并照明制，实行票拟制度。内阁大学士名尊位崇，但实权仍操在皇帝之手，他们不过充当了皇帝的顾问和咨询，对重大决策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清入关前，最高的决策机构称为“议政诸王大臣会议”。入关后，此制继续保留，与内阁互补互用。在中央，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就是通常所说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各部首脑称尚书、侍郎，都对皇帝负责，进一步说，皇帝通过他们，将国家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与明和明以前历代六部官制不同的是，顺治朝实行“复职”制，即各部尚书一职2人，由满汉各一人担任。此制用以体现“国家混一华夏，满汉并重”的建国方针^③。合六部与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通称为“大九卿”，以詹事府、鸿胪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顺天府、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等合称为“小九卿”，皆照明制或参酌隋唐以来的机构而设，直至清亡基本未变。

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明专设宗人府。清初照设不减，还另设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其长官称总管内务府大臣，简称总管大臣。其职责是专管皇帝及其一家的日常生活，相

① 《清史列传》卷六一，《张百熙传》。

② 参见王钟翰《清史续考》之《清代官制简述》，台湾华世出版社，1993年。

③ 福格：《听雨丛谈》卷三，第47页，中华书局，1959年。

当明以前宫廷太监的职掌。这一机构为清所独创，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取代了历代宦官的职能，防止如历代太监为害国家。但顺治十年（1654年）六月，顺治帝却起用太监，故有内十三衙门之设，又给寺宦为乱朝政以可乘之机。顺治十八年二月，康熙即位，宣布废除十三衙门，“内官俱永不用”^①。

理藩院为清代独创的又一重要机构。其前身称蒙古衙门，专管蒙古事务。后来，各民族事务日繁，交往日密，原衙门不足以处理日常的民族事务，遂于入关前，即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改此衙门为理藩院，与清朝相终始。这一机构之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地方，设行省制，以巡抚为最高行政长官；一个大的行省或相邻的一、二个行省由中央派驻总督，协调与监督地方政务与军事。一省之内，行郡县制，按府州县制进行组织地方各级政府。

入关后的清朝，在全国设治，特别是在中央建立政治体制，由辅政王多尔衮、顺治帝开其端，随着战争的胜利进行，各项建制亦随之而建。终于在明朝的废墟上重建成一代新的王朝体制，后经康熙、雍正，至乾隆，历百余年，不断变更或增减，遂成定制。

医治战争创伤，全力恢复或发展农业生产，是顺治朝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任务。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明朝留给清朝的是国家的残破、经济崩溃的乱摊子。从各地方官对当地经济状况的奏报，可知土地抛荒，“丁倒户绝”，百姓生活困苦到了极点！清官方《实录》及《明清史料》所编档案中，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

^①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一。